

媒体看江南

陈伟胜 主编



办一届有特色的亚运会

——访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刘江南

中国，广州亚运会会有哪些特点？
比赛项目上，除了有28项
亚运会增加了14
项目，其中
球等



今日中国，您认为广州市主办亚运
刘江南：我们在申办亚运会过程
体现了诚意、实力和潜力。首先
有着很大的诚意来申办。首先
分的增
团，给
是广
能行打
向政府
在政府
是广
中组
中组
大程，
已开，
能行打
1500
最主

米，广州的GDP以每年1000亿元的速度
增长，除北京、上海、广州在全国排
三，最后，广州具有很强的
作为一
广州具有

“既要干成事，也不能出事。
这样的亚运才算成功”

——专访亚运会组委会



NLIC2970861907

商共同开发，广
本电通公司是这
三。广州亚运会，我
通公司承诺一个资金
出了1.2亿元
在。在数
自实断了
见在，中
保险、健
三星、T
湾的台湾
我们的
一6倍，有
最多的一次。

时他左膝刚做了手术，带伤上阵，跑
集资金
见在，中
保险、健
三星、T
湾的台湾
我们的
一6倍，有
最多的一次。

作为见证并参与
几分之一，刘江南
光与风险同在。“比如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媒体看江南

主 编：陈伟胜

副主编：伍晓峰 楚爱英

编委会：张 喆 孙嘉晖 杜 娟 刘秀珍 刘杏薇 陈建族 赵乃虹

黄晓强 徐好娜



NLIC2970861907

一届有特色的亚运会

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刘江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体看江南/陈伟胜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668 - 0312 - 2

I. ①媒… II. ①陈…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5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7540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125

字 数: 339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4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江南是我大学时的校友，当然也是后来的朋友。大学时期的他担任学生会主席，自然是意气风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后来他考到广州体院来读研究生了，我在桂林待了三年后又去了上海，等我从上海再到广州时，他已是广州体院的明星教师了。这之后，他又顺水顺风地当了体育局局长，成为亚运会期间的新闻焦点人物，连他的官场勇退，也成为人们追踪的新闻，他着实是有明星相的。而这次由我这样一位不知名的学者来给《媒体看江南》一书作序，着实有点委屈江南兄了。好在我们是老校友、老朋友，还是同乡。我写得不好，想来江南也不会怪罪我的。

其实，在我眼中，江南始终还是一名学者，一位钟情于教育的体育人。他从广州体院走出来，带着学者的智慧与眼光，打造了广州体育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做派、新形象，最后他又回归体育教育，当起了民间足球学校的校长，意在将他的体育理念付诸进一步的实践，培养出新型的体育人才。

说他是学者，是因为他在当官时常用学者的眼光去看体育、领导体育，故许多体育的新理念皆出自于他，如他上任后对体育三大中心工作的看法“群众体育是根本，竞技体育是标志，体育产业是保障”就很具有学者的眼光与智慧。他提出体育要惠民、利民，让更多广州人变成国际化体育人的观点就很符合新时代的体育理念。他最早关注发展体育产业，并创造性地引进了“中巴大战”以及美国“梦七”队来广州表演，也是从一个学者的智慧出发，站在发展新型产业的高度去付诸实践的。当然，他也用一个能用英语去作申亚陈述并作新闻发言的体育局局长塑造了“广州市政府官员的新形象”，这自然也得益于他是一位学者。江南自己也说他身上更多的是人文气质，其实，也就是当官多了一些书生气。我的一位曾在省级组织部门工作过的朋友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为官也需要一点书生气，他是从正面去说的，因为身在官场没有一点书生气，会被官场恶习污染，会唯唯诺诺，没有个性，保留一点书生气是好的。但是，面对官场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应急处理复杂局面时，官员又不能没有书生气了。书生气于官真的是可有又不可多有，是是非非，又有谁能说清？那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去把握“度”了。

江南为人是真诚的。也正因为真诚，他本意是要低调做人的，但为了以体育之名而

推销广州，又不得不“高调”了一些。他没有太多的私己想法，为了整顿体育秩序建立规范，也多多少少地得罪了人。他的真诚也表现在他对待媒体上，他与媒体的友好合作给读者以及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南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他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体育教育了，他的回归将会画出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圆。衷心祝愿他在新的事业中更有成就感。我相信他这位老朋友还会创造人生的巅峰的。

蒋述卓

2012年10月10日于广州

（注：蒋述卓，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著名文艺理论评论家）

前 言

谁是刘江南？

他是一位官员。集党委书记、局长、院长于一身。他曾是广州体育的掌门人，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组织和执行者之一，但他唯实不唯上。

他是一位学者。留学经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他曾是全国学历最高的体育局局长之一，但他为学不迂腐。

他是一位健者。热爱运动、体魄强壮、朝气蓬勃。他是工作和生活的有机结合者，但他四肢发达，头脑不简单。

他是一位勇者。三次冒险救人，化险为夷，大难不死。他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但为了他人而舍生忘死。

他思路清晰，见地独到。

他思想解放，观念超前。

他沉稳执着，热情如火。

他敢于负责，不计得失。

他勇于拼搏，舍生忘死。

谁能说清刘江南？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尤以八卦文化为首。

八卦以天、地、水、火、风、雷、泽、山八种自然界的天象为代表性符号，囊括世间万事万物万理。

本书试图从媒体视角切入，以八种天象解构刘江南的为人处世。

《媒体看江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江南。

刘江南自述：两次负“债”铸造了我特有的人生轨迹

2010年，即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年，我将自己30多年来对体育研究的成果以《江南看体育》之名出版，众多阅读者颇感兴趣并予以好评！有位领导对我说“《江南看体育》反映了你的体育观，让人耳目一新！但让读者有点遗憾的是，你的人生观、世界观未能得到反映。通俗地说，社会如何看待你？却不得而知。如能将‘江南看体育，人们看江南’连在一起就好了”。就是这样，《江南看体育》的姊妹篇《媒体看江南》的构思浮出了水面。

《媒体看江南》立意很明显，就是想让人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刘江南的。而且这里的“别人”不是简单的和专门所指的人或群体，而是从某些方面代表了社会舆论和公众声音的“媒体”。出版该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很坦率，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借此从一个侧面看社会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种社会评价就是我从童年、少年、青年，直至现在，不惜用自己的艰辛和努力、汗水和泪水，甚至鲜血和生命，孜孜以求的“人生名誉”。

“名誉”，《辞海》的解释是指，社会对特定的公民的品行、思想、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集中体现了人格尊严。

中国有句名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所以，千古以来，大多数的人都很是顾忌自己的名声的。“名声重于金”，中国古语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患年不长也”。

古今中外，不少仁人志士对“名誉”有深刻的论述。例如，“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普希金）“把名誉从我身上拿走，我的生命也就完了。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名，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却要永垂万古。”（莎士比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

从以上名人的论述可知，名誉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学会爱惜它。这就是我从童

年、少年、青年，直至现在，不惜用自己的艰辛和努力、汗水和泪水，甚至鲜血和生命，孜孜以求的“人生名誉”。

1955年9月，我出生在广西容县一个干部家庭，20世纪4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父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风华正茂，已是县级领导干部并在地委和专署机关工作。但好景不长，1957年，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随后不久，家庭出身不好的母亲也受到牵连，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双双遭到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降级别、下放山区劳动改造的处分。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父母亲的冤假错案才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原来的政治待遇及行政级别，整整23年，我几乎都是生活在十分恶劣的名誉缺失，甚至是名誉扭曲，没有人格尊严的社会环境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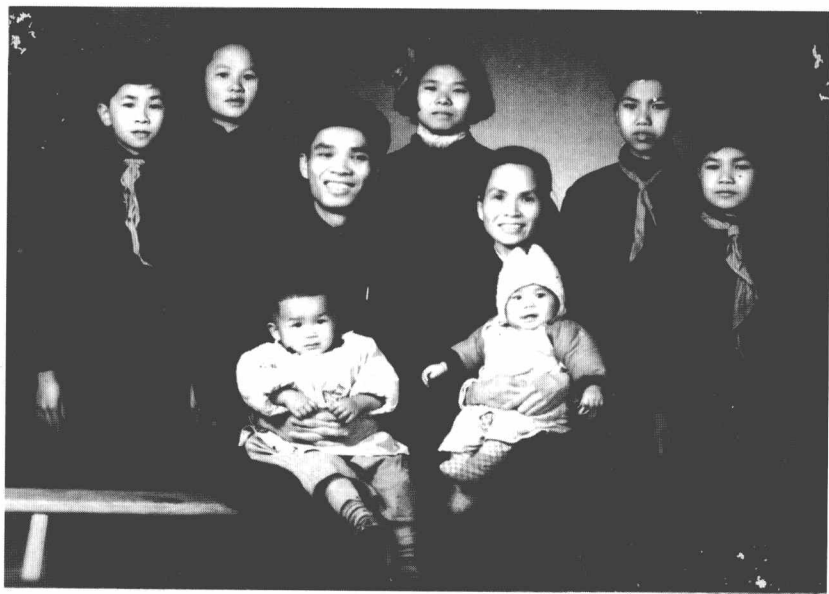


图1 这是拍于1956年的“全家福”（前排母亲怀抱中的是本人），
当时父母亲均为容县地委和专署的年轻领导干部

我近3岁的朦胧记忆中，在群山环抱的简陋平房里，每天我都听着公鸡的打鸣声和山鸟的欢叫声醒来，看着父母肩扛着铁铲、锄头离我们而去，晚上很晚很晚，当绿豆般大的煤油点亮时，我才见到疲惫不堪的父母归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已经被组织处分，下放劳动改造。我们家从地委机关所在地容县来到了博白县谢广林场。1960年，先是母亲得到了从宽处理，被允许带着小孩从山区回到县城（两年以后，父

亲才离开林场回到县城工作)，我才得以进入幼儿园学习。幼儿的生活是幸福的，没有“阶级”的界线，也没有政治的意识，只是有由于能力的差别而被老师“重用”的机会多少。我常常被老师指定，带领小朋友们读书、做游戏。这时的我感到自己和小朋友们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还有一些优越感。不久，整个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母亲又被单位下放到离县城十多公里远的亚山鸡场工作，我每周六都随着来县城运粮食和蔬菜的马车到鸡场与母亲见面。

结束了幼儿园的生活，我于1962年进入小学一年级，直到1968年小学毕业。在六年多的小学生活中，前3年，在极“左”的思潮尚未形成的时候，我还能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生活。按时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并被选为中队委员。后3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逐渐被列入另类，成了不被看好和重用的学生，中队委员也不能当了，后来的红小兵也不准加入。从1966年开始，我每学期都要填写入学注册表，其中一栏目是“家庭成分”。过去，我都是根据父母的职业，填写为“干部”。但当时却不准这样填写，必须填写祖父辈的出身！这样一来，我的家庭成分被迫填写为“地主”。从此，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是“坏人”的后代！我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人生思想包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进一步蔓延。1967年到1969年间，广西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在我所在的博白县城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除了一般的群众遭殃之外，最悲惨和可怜的可能就是被称为“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叫“黑五类”分子）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五类分子”整批被“造反派”拉到荒野枪杀的残状！我和比我大一岁半的二哥、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在一片惊恐的环境中，结束了小学阶段的学习，并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这时，我父母亲已经被“造反派”关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我们成了虽然有父母，但事实上没有家庭温暖的“孤儿”！记得非常清楚，在1968年深秋的连续几个傍晚，我亲眼目睹了好几个我们平时称为“叔叔”的县直单位的领导，头戴高帽，胸挂名字被打红叉的大牌，被“造反派”五花大绑地押解着，游街示众。刚走到十字街口，一群无知的群众蜂拥而上，向他们吐口水、扔石子，甚至几个极端分子冲上去，拳打脚踢，拿起拳头般粗的竹竿，使劲地往他们打去！开始，这些“叔叔”还下跪求饶，但不过几分钟，他们就无奈地躺倒在血泊中任人抽打而再也起不来……当时，我们是多么害怕，多么担心！要是父母亲也被“造反派”押解并游街示众，我们怎么办？是的，按当时的说法，他们是“走资派”，但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不能没有他们！可是，我们的力量又是那么渺小，怎么救他们呢？在那近半年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无依无靠的几兄妹，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好在我们担心的情况

没有发生，父母虽然在各自的单位的批斗会上被无情地谩骂、殴打，母亲甚至被殴打至当场晕倒。但是，却避免了被拉到街头示众，被一些极端分子乱棍打死的悲惨状况。

“武斗”结束后，学校又开始了新的学年。和我们一起小学毕业的同学，都升上了初中，继续他们的学业。但我们，却因为是“黑五类”的孩子，而被拒之门外。父母亲被强行关押，离开了我们，这已经使我们感到无比地悲哀！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更是使我们感到雪上加霜！为了争取得到学校的同情和理解，由我代表我们兄妹，执笔写了一封信，并到县城仅有的两间中学去，当面向领导递上饱含我们希望、情真意切的这封“求学信”。我们在信中表示我们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做让人民放心的好孩子，哀求给我们回到学校读书的机会。我难以相信，过去这些和蔼可亲，我们极为尊重的老师和校长，当时怎么会变得那么冷酷无情！“不行！我们学校现在要培养的是工农兵子女，而不是像你们这样的地主和右派的孩子！”我们得到的几乎是同一版本的回答，我那颗幼小的渴望读书的心灵绝望了！

面对这残酷的人生，我产生了三点深刻的认识。第一，我的父母与一般小孩的父母不一样，他们是“犯了严重错误的罪人”！是欠了社会的“债”的人。第二，我与一般小孩不一样，他们是人民的孩子，而我是“罪人”的孩子！父母欠的债，我必须承担。第三，在人生道路上，如果把起点比喻为平地的话，一般孩子的父母可为他的成长提供一定的平台，而我，不但得不到这种平台，反而父母欠了社会的债，就像给我挖下了一个坑，我人生的第一步必须从坑底奋力爬上地面，然后才有资格和一般人一样，继续人生之路！

由此，我立下了“凡事比人严要求，凡事比人倍努力，凡事比人多吃亏”的处世原则，立下了“我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好人”的人生志向。

明白了人生道理，知道了人生道路的艰难，我就要将自己的处世原则付诸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志向。

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志向呢？当时还是“文革”期间，也是“英雄”辈出的年月。要证明自己是好人，就是要做好事，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

童年时期，正当“文革”，我时无父母管教，无学校教育，无组织关心，处于流浪飘荡的生活状态。尽管如此，我想尽办法，多为集体、为邻居做好事。我记得，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自觉参加抗洪抢险的社会活动。1969年的夏天，南流江洪水泛滥，严重威胁到离新码头不远的县盐业公司、五金公司等仓库物品。县革委会向县城机关发出号召，动员所有干部职工，奔赴一线抢救国家财产。我得知这一消息，主动参与这一抗洪抢险活动。我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几乎整整一天，来回奔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三无”小孩在干什么。事实上，我也毫不介意是否

被人关注。干了一天，十分疲惫，但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做了好事，我是“好孩子”！

少年时候，经过千辛万苦，通过种种关系，在失学两年后，我和二哥在籍贯陆川县的一个农村学校获得了读初中的机会。后来，父母从“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解放出来后，我们转学回到原来的县城初中。再接着，我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允许继续升上高中，而同时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也很好的二哥，却再也没有上学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学校，虽然我总是被列入被歧视的群体，不能当选学生干部，不能加入共青团，不能当三好学生……但我百倍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严格遵守学习纪律，做出色的好学生。我学习认真，劳动刻苦，体育拔尖，成为大家私下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图2 1974年全家欢送我上山下乡（后排左二是本人）

高中毕业，我和千百万同龄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工农的再教育。不同的是，我“上山”的地点，恰巧是以前父母被下放劳动改造的林场。我深知“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观念会深深扎根于博白林场一些干部职工的头脑，我父母的影响会伴随着我在林场的每一天。因此，我行为小心谨慎，为人谦虚诚恳，生活遵纪守法，工作拼命至极。最苦最累的活我去干，最危险的岗位我担当，我以自己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人们对我的偏见，获得了组织对我的信任，成为劳动模范，并最终获准加入了共

青团，这让我感动万分。（从初中开始，我就积极申请，但是一次一次地申请，一次一次地被拒绝！）当时，我还两次被单位推荐去读书，但最终还是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录取方拒绝。事实证明，我是一个“好工人”。

人生的炎凉和道路的坎坷，使我很小就认识到，要获得正常人的生活资格和条件，必须比一般人多一些特长。因此，我从小就选择了体育。今天，我能成为职业体育人，除了具备一定的先天条件外，更多的是客观的要求和后天的努力。七八岁开始练游泳，十三四岁开始练篮球，十五六岁开始练田径，我在训练中表现的自觉、刻苦、拼命精神都是有口皆碑的！我所参加的运动项目，在县里样样都是很拔尖的。田径和篮球，我都是地区队队员并多次参加自治区比赛；游泳曾经被来县选人的区体工队看上，但他们一了解我的家庭出身，便放弃了想法。虽然没能进入专业队接受系统的训练，但以业余队的标准，我的技术、身体素质，都是一流的，我不愧为一个“好运动员”。这为我后来的体育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3 1973年代表广西玉林地区中学生田径队参加自治区比赛（右一是本人）



图4 1977年作为广西博白县篮球队队员留念（右边为本人）

1977年夏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当时正在玉林地区篮球队进行集训并准备参加第四届自治区运动会。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求学问题上屡屡受挫，我对上大学不敢有任何的奢望。因此，不敢应母校的邀请，参加全脱产的强化复习班。只是为了应付父母的要求（父母总觉得因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女的前途，希望我们能通过读书改变人

生命运)而随大流,边集训边复习,参加平生的高考而已。报志愿的时候,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便不敢填报名牌大学,不敢填报好的专业,就填报一个与政治相对较远的体育专业。我没想到,自己的高考成绩非常不错!在当年全广西的13 000多名体育考生里面,成绩名列第一。文化成绩每科平均分数达68分。按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标准,我完全可以进入许多重点大学就读。由于当时招生程序的不规范,我以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的成绩,被录取到广西师范学院体育系。



图5 高考制度改革后,我和妹妹刘春红(小名叫小菲)一起参加77级考试被录取,全家于1978年春欢送我们上大学(后排左二为本人)

1978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我父母亲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长期负重于心的“父母造成的错误债”终于解脱了!可是,在这之后不久,我又背上了新的人生“债务”。

可能是因为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我得到了学校的特别重视,一入学,就被指定为班长,不久,又升为年级级长,不到一学年,又被组织推荐为系学生会主席和当选为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教师)。我按照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习惯,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尊重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艰苦朴素,由于我思想进步,学习优秀,体魄健壮,得到了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1979年到1980年初,我在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开展评选“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当中,先后被命名为桂林市、广西区、全国的“新长征突击手”;当选为桂林市秀峰区、桂林市人大代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院以我的真实事迹,组织编排了名为“刘江南擒贼”的文艺节目,参加全国大学生汇

演获奖。这时候的我，可真是“报纸有我的事迹，广播有我的声音，电视有我的形象”，真是“红得发紫”！这种政治待遇，是我过去作为“右派儿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想都不敢想的！这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使我忐忑不安！系总支书记的“刘江南，你是组织树立的一面旗帜，一定要从严要求自己，永葆先进性”一番话，更使我诚惶诚恐！我感到，我做的很少很少，组织给的太多太多！付出与得到相比，我是负债累累的！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付出生命，填补自己所欠下的“荣誉债”！1981年冬，当媒体就毕业理想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了一番话：“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如果在全院近四千名学生中，需要有一人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去牺牲的话，我刘江南就是第一个！”（这段话发表在《广西师范学院》院刊上）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所在！



图6 1980年在广西师大读书期间，我当选桂林市人大代表和学校
“两会”代表时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本人）

1982年初，大学毕业，我作为政工干部的培养对象，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和团干部，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一年后，我考取了广州体育学院教学与训练专业研究生，是母校体育专业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仅有的两人之一。



图7 1983年，我和研究生同学在一起（左边为本人）

人生两次负“债”的感受和由此而形成的生活轨迹，使我继续在实践中自己的处世原则，追求自己的人生志向。

1. 离开广西，到广州攻读研究生

1983年7月，我告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广西，来到了南方最大的都市——广州。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书记是研究生部主任），因学习成绩优秀，毕业论文富有创意，被广东团省委和学联、高等教育局等评为“开拓型学习研究生”。

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我比别人更加刻苦地教学和研究，在短暂的9年时间里，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参与编写或编著了多部教材和书本，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走完了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任职历程，于1995年成为广东省高校体育专业第一个被破格提升的教授。在同一时间里，我先后担任了田径教研室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科研处处长、学院党

委办公室及学院办公室主任、学院副院长等不同岗位的管理工作。由于在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两个方面，我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绩，被省高教局、人事厅等五单位，评为“南粤优秀教师（特等奖）”，进而，被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命名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图8 在广州体育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与自己设计的动作频率测试车

者”。在2001年的广东省高校系统院、校级党员领导干部“三讲”活动中，我获得了100%的通过率。

2. “洋插队”，留学美国

1999年到2000年，我通过了英语考试，被广东省委组织部作为高级管理人才，选派到美国进修公共管理学（我是连续5年外派的300名厅、处级领导干部中唯一的体育干部）。在学习期间，我坚持“成才为目标，管理为课程，英语为工具，对象为美国，服务为广东，实践为途径”的学习方向和要求，在认真刻苦学好六门课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美国体育产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了五万字的题为“美国体育产业的调研及思考”的论文（该论文被评选为第一批“高培班”60名领导干部中5篇优秀论文之一）。在国外学习，我的英语大有进步，回国后，我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学科的博士研究生，3年后如期毕业。

3. 离开高校，走进政府，学者变官员



图9 林树森同志给我颁发任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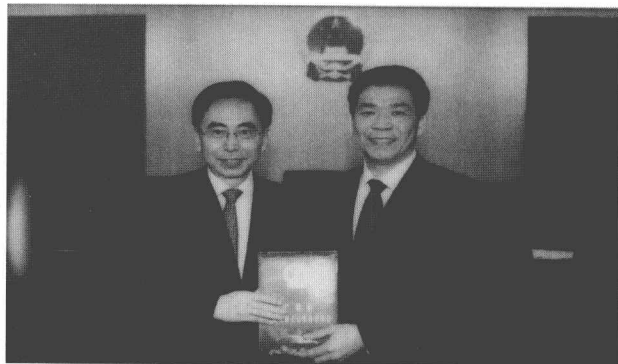


图10 朱小丹同志给我颁发任命书

2002年春，经过省、市党组织三次的协商，我最终服从安排，离开学习、工作了近25年的高校，从任职5年的广州体育学院副院长岗位平调到广州市担任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在申办亚运会的过程中，我兼任“亚申委”常务副秘书长，在筹办、主办亚运会过程中，先后兼任过“亚组委”副秘书长、市场开发部部长，2009年还兼任了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眷恋不舍，经过自己的申请和广州市委领导的批准，我可以在完成本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继续带研究生。因此，我从1991年起，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广州体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导师，2008年后，还被华南师范大学聘任为博士生导师。我还是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外7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研究员）。除此之外，我还兼任了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

4. 自请提前退休，退出官场，担任民营足球学校校长

2012年3月，在2010年广州成功举办第16届亚运会，全城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的时候；在2011年率领广州体育代表团参加第6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并取得金牌、奖牌、总分三项第一，创历史最好成绩的时刻；在2011年11月，带领广州申办代表团远赴新西兰争得201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举办权，使广州成为全国唯一能举办世界羽毛球“三项顶级赛事”的大满贯城市之后；在广州恒大足球队获得中超联赛冠军，广州富力足球队冲超成功，广州足球全面振兴之时；在任职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即满10年，广州体育呈现“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成绩斐然，体育产业方兴未艾”之际，我毅然选择了“弃官从教”的道路，向中共广州市委递交了自请提前退休和到民营企业任教的申请。获得批准后，从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变成了恒大国际足球学校校长，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广州，来到了群山环抱的足球学校所在地——清远市清新县。这一抉择，成全了我“从山中来，回到山中去；从校园来，回到校园去”的有趣人生轮回！

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使我认识到，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最高境界就是关键时刻能否挺身而出，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人生的旅途中，我经历了“豁出去了”和“拼了命了”两个层面的考验，下面我从中各取几个事例。

首先是“豁出去了”。所谓“豁出去了”，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考虑事情后果，认准了就往前冲！

1. 为保护国家山林“豁出去了”

1975年春天，林场和林区周边群众的关系非常紧张，山林纠纷案件非常突出，甚至发生了护林员被绑架殴打的情况。在我负责的林区内，有一个××生产队，相当部分的群众蛮不讲理，强行毁林开荒，大片偷砍林木。虽经林场与当地党组织联系，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但由于观点难以统一而未果，反而使场群矛盾更加激化，成了“阶级斗争”最复杂、工作环境最危险的地区。老护林员对此无可奈何，分场领导避而远之！当时，我到林场不到半年，还不到20岁，就被组织指定为护林员。每天，看着大片大片的树林被毁，我的心一阵一阵地刺痛！我在父母的鼓励下，毅然向组织提出申请，只身到该村“蹲点”。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教育和感化村民，建立新的场群关系，扭转毁林开荒的局面。组织鉴于再无他法，同意了我的申请。

我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那是1975年的3月12日，我告别了林场的知青战友，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林场党组织的介绍信，先到当地大队党支部接上了关系，然后，由大队干部护送，迎着寒意料峭的春雨，踏着泥泞的田间小道，以“三同工作队